

# 汉代女性教育与文学

鞠传文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汉代女性教育以家庭教育为主要方式。一些出身于官僚、贵族、士大夫家庭的女性除接受女德、女子艺术教育外,多有诵经读骚,广观博览,以至于能通百家之言者,良好的文化素养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必备的先决条件,这些“博学高才”的女性促成了汉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汉代女性教育,对汉代女性作家的生成及其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汉代; 女性教育; 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 I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07)05-0160-04

两汉没有针对女性的社会性教育活动,家庭是女性获得文化知识的最主要途径。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明经入仕,迄于东汉,太学、郡国学、民间私学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家庭教育也呈繁荣之势,所谓“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sup>[1]</sup><sup>3107</sup>,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经学既成父兄的事业,许多官僚、贵族、士大夫之家的女性,在父兄的教育和耳濡目染之间亦得修习的便利。检《史记》、两《汉书》之外戚、皇后、列女及其他有关女性传、纪可知,知书、博学的女性从西汉到东汉呈明显增多的趋势,这与汉代整个教育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而两汉文学成就突出的女性作家,如班婕妤、班昭、徐淑、蔡琰等,无不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因此,探讨两汉女性教育,对于了解教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便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一、汉代女性教育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大抵要扮演三种角色: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核心是“事人”。为了更好地“事人”,“女功”的学习不仅必要而且必须,纺织缝纫、整治饮食是其主要内容,整个封建社会大抵如此。相较之下,汉代女性教育以下几方面显出特色。

### (一)女德教育趋于严苛。

“德言容功”,“德”居女子“四行”之首。“女德”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女性的“事人之道”,即全力模塑那种能够孝顺父母、侍奉公婆、顺从丈夫、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1. 女德体系的不断完善。女德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已萌芽,经过一批汉儒的煽扬,到东汉中期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女德体系。汉初陆贾提出以“礼”来规范女性,以培养女子柔顺服从的品质。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从“天人感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出发,明确提出了“阳尊阴卑”、“三纲五常”的理论,并将之系于恒常不变的天道。西汉末刘向的《列女传》,用生动的历史故事说明贞顺、节义等可供效法的女性伦理准则。东汉班固主撰的《白虎通》,在封建“法典”的意义上确立了“夫权”的绝对权威,对女性的地位作了更加残酷的贬抑。继而,班昭的《女诫》,以“卑弱”为宗旨,系统阐述了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格局中,女性应具备的道德及其理论根据,从而完成了汉代关于女德体系的理论构建。

2. 女德教化的日趋加强。女德理论体系趋于完备的同时,统治者以孝治国之类的政治实践力度也在加大,自孝惠以后历代汉帝以“孝”名谥;庠、序、校置《孝经》师以导学,乡、邑设“三老”、“五更”以助教化;设孝廉一科以行选举。除此之外,更有直接针对女性的贞顺节烈之名利诱导,如汉文帝褒奖陈寡妇,宣帝“诏赐贞妇顺女帛”,平帝令各乡推举一名贞妇并免除其赋税徭役。从个别的褒奖到普遍的惠施,力度不断加大,从而使汉代的女德教育由外在的教条规范,逐渐内化为女性自觉的道德践履。据统计,两汉的贞节女性见于史载者共计54人,其中东汉52人,而西汉仅有2人<sup>[2]</sup>,即是明证。由上述可见,无论

收稿日期:2007-04-20

作者简介:鞠传文(1961—),男,山东省荣成市人,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山东科技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

是理论还是实践,汉代的女德教育从前到后有逐步严苛的趋势。

## (二)艺术教育雅俗并存。

汉代女子艺术教育,主要包括音乐、歌舞、书法等内容。

1. 歌舞、琴艺的学习。两汉之时,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侈靡之风愈演愈烈,从皇帝、贵戚到公卿及其属僚,无不竞于奢侈,赏乐、观舞、听歌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如西汉后期,王氏五侯兄弟“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sup>[1]4023</sup>《汉书·礼乐志》描述哀帝时俗乐蔚然成风的盛况:“是时,郑声尤甚……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风气之下,“女子弹弦跕躑,游媚富贵,徧诸侯之后宫。”<sup>[1]655</sup>以至哀帝要通过罢乐府,“放郑声”,以匡世风。至于官僚、士大夫、富贵人家的女子知音晓律,则是才艺富赡的表现,也倍受称赏。卓文君通晓琴音,王昭君擅长琵琶,徐淑的丈夫赠素琴以舒忧,蔡琰更以“妙于音律”而载入青史。音乐、歌舞的学习,也成了汉代女艺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2. 书法的学习。《汉书》、《后汉书》本传中,屡屡提及汉代女性对“史书”的兴趣,如冯嫫、和熹邓后“能史书”;孝成许皇后、左姬小娥“善史书”;顺烈梁后“好史书”。这里所谓“能”或“善史书”,实为对精通并善于书写古文字者所作的赞美之词,是书法艺术的滥觞<sup>[3]</sup>。蔡琰深得其父蔡邕书法的真传,兼善楷书和草书,后来又传其笔法于魏大臣钟繇,钟繇成为当时“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的著名书法家;大司农皇甫规的妻子马夫人“能草书。时为规荅书记,众人怪其工。”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还说她“工隶书”。

## (三)文化教育经学化明显。

汉代女性文化知识的学习比较宽泛,包括经学、诸子、辞赋乃至天文、算术等。汉代女性发蒙之后,以《诗》、《论语》的学习最为普及,但自武帝兴学以后,经学昌明,“户诵七经”,汉代女性所习也遍及诸经。虽然其卓犖者突破了经学的范围,如明德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sup>[4]409</sup>但总的看来文化教育的经学化倾向明显,尤其是东汉以后,习经者数量明显增多,年龄趋小。

综上所述,汉代的女德教育、艺术教育、文化教育,不仅促进了女性的社会化,也提高了她们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养,为其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 二、汉代女性文学创作

检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汉文》、《全后汉文》、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

南北朝诗》、费振刚等辑校的《全汉赋》等,得汉代女性今有作品流传者38人。其中4人《隋书·经籍志》录有专集:《班婕妤集》一卷,班昭的《曹大家集》三卷,《徐淑集》一卷,《蔡文姬集》一卷,皆佚。由于两汉女性专集佚失严重,今已难窥其全貌,仅今所见,其作者之众,作品之富,也许尚无法与同期及其前后的男性作家相比,但从中可窥见汉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其受教育的密切联系。

### (一)思想内容上的自抑倾向。

作为女性以礼义自绳、贞节自缚的自抑心理,西汉女性创作中尚极为少见,而东汉则较为普遍,且愈是受过良好的教育,这种自抑倾向愈是明显,不能不说是女性教育在创作中的投射。前述东汉贞节女性激增,这与两汉女性文学中自抑倾向的表达若合符契。

汉初女教不苛,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曾说:“汉初妃后多出微贱”,“婚娶不论行辈”,“汉公主不讳私夫”,“汉诸王荒乱”。宫廷、藩国如此,民间婚姻也多得自主,如朱买臣妻弃夫再嫁,寡居的卓文君私奔相如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故以礼教自抑之作少见。《西京杂记》曰:“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真。而到了东汉,由于经学教育、社会教化的加强,儒家规范女性的条教已内化成为她们的行为准则,这从班昭、徐淑、蔡琰的作品中可以看到。

“博学高才”的班昭,幼承母师之典训,14岁嫁人,丈夫早卒,“有节行法度”,“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sup>[4]2784</sup>成为封建大家长推崇的女德典范。其训导女儿的《女诫》七篇,也更多地表现了她对男权社会所赋予女性的礼义贞节的自觉认同,如“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儒家规范女性的条教,在文中则成了班昭作为不易之论的立言根据。她在认同女子生来“卑弱”的先贤古训的基础上,要求女儿贤以事夫、敬以顺夫、完善女子“四德”等,成了后世久传不衰的女德教材。

另外,“善属文,能草书”的皇甫规之妻,丈夫死后,执节不嫁董卓,直接惨死于杖下,人号曰“礼宗”。曾饱经丧乱、三易其夫的蔡琰,在其杰作《悲愤诗》中,真实地展示了妇女改嫁后所难以承受的礼教规诫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托命於新人,竭心自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只能以“鄙贱”之身,在随时可能被抛弃的忧惧中度

过余生。

从她们情辞恳至的训诫中,她们毁形不嫁或宁死不屈的贞节执守中,从她们再婚后的灵魂负疚中,可见出女德教育使之对男权社会所赋予的贞烈、节义观念已自觉认同,她们或付之于行动,或诉之于文学,表现了深厚的女性文化底蕴。

## (二)体制和用典。

从汉代女性文学创作所采用的体制形式和写作技巧的运用上,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汉代女性教育与文学之间所发生的联系。

1. 体制。今检38位汉代女性作家的作品,有诗歌、辞赋之作者15人。所作诗歌,就体制而言,主要有三种,即骚体、五言、杂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采用了骚体形式,如刘细君的《悲愁歌》、华容夫人的《和刘旦歌》、赵飞燕的《归风送远操》、徐淑的《答秦嘉诗》、蔡琰《悲愤诗》之二等,其间除徐淑诗是“二一二”节奏,“兮”字居中的独特骚体五言形式外,其余都是典型的骚体抒情歌诗。就赋作而言,有班婕妤的《自悼赋》、《捣素赋》、班昭的《东征赋》、《蝉赋》、《针缕赋》、《大雀赋》、丁广妻《寡妇赋》、马芝的《申情赋》(存目),共计4人,其中二班的代表作《自悼赋》、《东征赋》都是骚体抒情赋。

由上述情况可见,她们的诗、赋创作来自楚辞的影响最为突出。或直接采用了骚体形式,或带有从中演化而来的痕迹。这与汉廷楚声的广泛传播及汉代诵读辞赋的时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身份来讲,这些作者多为汉官中人,她们既是楚歌、辞赋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创作者。

2. 用典。举事以征义,引辞以明理,本是文章写作常用的手法,诚如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所言:“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因此,古今作者莫不取资其中,借力凭风,言志炫才。但“歌”的“当下性”决定了其直抒胸臆的表情方式。汉代女性的诗歌创作,多以“歌”命篇,大都是“悲”则作“歌”,“怨”则发愤,情动于衷,直泻而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所以往往不讲技巧,不假比兴,也极少使事用典。但是,在她们的辞赋和散文作品中,用典之处却俯拾皆是。所以,我们从中可见出其观览之所及、学养之肥瘠及其时代的特点。

先看班婕妤《捣素赋》、《自悼赋》的用典情况。《捣素赋》写捣素女的“幽闲贞专”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绿》之章,发《东山》之咏。”连用四典,同出于《诗》。“皎日之心”出自《王风·大车》:“谓予不信,有如皎日。”“甘首疾之病”出于《卫

风·伯兮》:“愿言思伯,甘心首疾。”《采绿》、《东山》两篇名,分别来自《小雅》和《邶风》。其直接引用《诗》篇名者,又见于《自悼赋》末句:“《绿衣》兮《白华》,自古今有之。”《毛诗序》以为分别是卫庄姜伤己失位之作和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作,班氏并师其意。还有一处,引用四典:“悲晨妇之作戒兮,哀褒閼之为邮。美皇英之女虞兮,荣任姒之母周。”“晨妇”语出《尚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褒閼”,即褒姒,“任姒”即周文王母太任和周武王母太姒,见于《诗·大雅》,亦与“皇英”即舜之二妃娥皇、女英并见于《列女传》。

再看徐淑《答夫秦嘉书》、《又报嘉书》、《为誓书与兄弟》及《答秦嘉诗》的用典情况。徐淑三“书”及诗共用十典,“梁寡不以毁形之痛忘执节之义”,事载于刘向《列女传》,见前;“谁荣之叹”出自班婕妤《自悼赋》:“神眇眇兮密覩处,君不御兮谁为荣?”;语出《论语》者有二:“仲尼执鞭之操”化用《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博我以文”语出《论语·子罕》:“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其余六典都集中在《诗》中:“谁谓宋远,企予望之。”语出《诗·河广》;“萱草”、“飞蓬”同出自《诗·伯兮》:“焉得萱草,言树之背?”“自伯之东,首如飞蓬。”“高山景行”语出《小雅·车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晏婴不以白刃改正直之辞”事载《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见于《韩诗外传》卷二;《答秦嘉诗》:“瞻望兮踟蹰,伫立兮徘徊”,撷取《邶风·燕燕》“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至于班昭的赋、文,单是《女诫》一文,即涉及《诗》之齐、鲁、韩、毛四家,《礼》之《仪礼》、《周礼》、《礼记》、《大戴礼记》,《周易》、《尚书》、《左传》、《论语》、《孟子》、《荀子》、陆贾《新语》、董仲舒《春秋繁露》、刘向《列女传》、班固《白虎通义》等古代典籍和当代著述几近20种,还有汉代流行的“鄙谚”。其文如此,其赋也多引经据典,《东征赋》移步换境,历述沿途所见历史人物和事件,有孔子厄匡、子路死蒲、蘧伯玉之贤、季札适卫等。引语则出于《论语》者十、《诗》者三、《礼记》者一、《左传》者一、《法言》者一、《荀子》者一;《艺文类聚》所收《针缕赋》、《大雀赋》、《蝉赋》三篇咏物小赋也各有所引。

由上述,可见以下几点:首先,汉代一些长于赋、文的女性多用典使事,但有宽狭的不同。班婕妤和徐淑所引多出于《诗经》、《论语》,而班昭则经、史、子、集,纵意渔猎,综采无遗。其次,就用典形式言,有词语、语句、题目的明引,但更为普遍的是语句的化用

和语意的暗用,表现了很高的艺术表达技巧。

第一,举事征义,引辞明理,无不恰切精当。班昭《女诫》,引经据典,阐发己说,如“《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说明和柔叔妹,与之同心,叔妹自会在舅姑面前称誉自己,可谓用人如己,而毫无生硬隔膜之感。徐淑以晏婴守臣节不怕死、梁寡守妇义毁形不怕痛,表达自己执节不嫁的决心,“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都可谓“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sup>[5]</sup>。

第二,借语写意,独居匠心。如班婕妤写捣素女的“贞专”之性,或撷取语词,或引用《诗》题,以数言而囊括全诗大意,娴熟地驱遣《诗经》中的《大车》、《伯兮》、《采芣》、《东山》数诗,用以表达捣素女从热恋的誓词到相思的痛苦,到痴想丈夫归来后将时时相伴,到悬揣丈夫已踏上归途正思念着自己,不仅多侧面、多角度,有层次地表现了女子的痴情,而且对《诗》有着自己独特的解会,如将上述诸诗皆视为情诗,即可谓匠心独见。

第三,融会贯通,使语言充满张力。徐淑的两封《与嘉书》,用典有五,除一处暗用成句,仅易一字外,其它都是将其融会贯通,化成自己的血肉,泯灭了原文的蛛丝马迹,大大地增强了文字的张力。如《诗·河广》是写住在卫国的一位宋人思归不得的诗。宋、卫之间仅一河之隔,诗极言宋国不远,黄河不宽,回

去极易,却因某种阻隔而不能如愿。徐淑暗用其语:“谁谓宋远,企予望之。”以表现丈夫即将赴京,自己虽近在咫尺,却抱病在身,欲面别而不能的焦灼心情,极为贴切而含思深婉。又将暗用的诗句,易“跂”作“企”,还其本字。《说文》:“企,举踵也。”“跂,足多指也。”企和跂本意不同,虽一字之易,非熟读精思,安能如此!同样,徐淑以“萱草之喻”、“飞蓬之感”、“谁荣之叹”三典,表达夫妻离别之后,相思之情的无可排解和“女为悦己者容”的情思,都将缠绵的情感,潜转内敛,婉曲出之,既达乎情止于礼,又淋漓尽致。

汉代女性创作长于使事用典,这与其对文本的熟诵精研大有干系。《诗》、《论语》是许多女性发蒙之后常用的读经课本,诵读是主要的学习方式。耳濡目染,耳熟能详,形之于文,情不自禁,自然而然便会流露出来,留下痕迹,所谓心到手到,二班及徐淑的创作多受《诗经》、《论语》的沾溉盖缘于此。至于班昭出入经史子集,左右采获,使古人于笔下奔命不休,这除了家学渊源外,与她本人的著、授《汉书》,为赋、文作注,广观博览,以“博学高才”称有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汉代女性教育与女性文学创作之间确乎存在着深刻的联系。汉代女性教育,对女性文学创作的语言、体制及思想内容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

#### 参考文献:

-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M].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27.  
 [3] 富谷至.“史书”考[J].西北大学学报,1983(1).  
 [4]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343.

(责任编辑 王 平)

## Feminine Education In Han Dynasty And Literature

JU Chuan-w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mode of education for female in Han Dynasty was family education. The women in the families of bureaucracy and noble read “jing” and “sao” besides accepting education of morality and art, so they had wide scope of knowledge and were accomplished in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Good accomplishment of culture provided them with preconditions for creation. These learned women caused the prosperity on literature of female. The education of female in Han Dynasty brought deep influence on producing female writers and thought and form of creation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Han Dynasty; education of female; creation of literature